

● 钱仲联 主编

明清诗文研究资料辑丛

Ming qing shi wen Yan jiu zi liao ji cong
Ming qing shi wen Yan jiu zi liao ji cong



编 选 说 明

苏州大学中文系为了填补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比较薄弱的环节，于1981年成立明清诗文研究室，至目前为止，是全国唯一研究明清诗文的机构。本室在钱仲联教授的领导下，致力于明清诗文的研究、整理，做了大量工作。除重点编纂《清诗纪事》一巨编外，还刊印了内部交流的丛刊三辑。在工作过程中，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清代作家的后裔等经常的联系、协助，并以未刊的珍贵的遗稿等相饷。兹择其中篇幅较少的部分，汇辑成编，公开问世，为研究和阅读明清诗文的同志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资料。以后珍贵资料积到相当数量时，再刊行续编。

苏州大学中文系明清诗文研究室

目 录

归有光的谱系·····〔日本〕佐藤一郎 杨松涛译	(1)
钱遵王诗集考·····〔美国〕谢正光	(19)
冒襄余怀交游考·····顾 启 姜光斗	(31)
侯方域年谱·····徐植农	(51)
姚梅伯年谱简编·····赵杏根	(74)
批《樊榭山房诗》·····钱 载	(105)
《翁评〈渔洋精华录〉》平议·····陈 衍	(110)
章太炎先生手批《二林居集》辑录·····沈延国校录	(125)
吴门韩氏家藏未刊诗稿·····	(148)
示朴斋骈文续存(未刊稿)·····钱振伦(遗著)	(151)
春在堂集外诗词十七首	
——记俞曲园先生晚年的一组诗词手稿	
·····张志新 江洛一	(196)
学制斋未刊稿·····李 详(遗著) 李传珉辑	(219)
西河词选·····黄 人(遗著)	(226)
黄摩西未刊词·····黄 人(遗著)	(237)
近代诗人三十八家评传	
苏州大学中文系明清诗文研究室·····	(240)

归有光的谱系

〔日本〕佐藤一郎 杨松涛译

(一)

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号震川，是明代有代表性的著名古文作家。由于他生前六十六年的生涯，与拟古主义派的盟主李攀龙(1514~1570)那种风靡一时的文坛生活几乎处于同期，所以他在文坛中的处境相当孤立。当然，他曾与王慎中和唐顺之并称为嘉靖三家，但其在世时的地位却远低于王唐二人。比如，李攀龙在《送王元美序》中，曾以王慎中、唐顺之为对手展开论战，然而却未提归有光的名字。如果不是疏漏的话，通观《沧溟先生集》三十一卷，一次也未提起归有光。尽管归有光是位作八股文的高手，但可能由于他直到花甲之年才中进士，所以不论在文坛上还是在社会上，都很不得意。加之家中又接连亡妻丧子，在生活上也很不走运。

但是，能否因归有光的文章几乎没有超出其家乡昆山和邻县嘉定的范围之外，就说他是国内默默无闻的人呢？当然也不能。有些资料证明，尤其到了晚年，他在某些地区的声望还是很高的。比如，在归有光自己写的《己未会试杂记》

(时嘉靖三十八年，五十四岁)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予自石佛闸与铅山费楸林步行至济州城外，遇泉州举子数

人，共憩市肆中。数人者问知予姓氏，皆悚然环揖，言：‘吾等少诵公文，以为异世之人，不期今日得见。’云云。”

按福建省的泉州是晋江的邻县，而晋江则是嘉靖三家之一的王慎中的出生地。儒教的叛逆者李贽（字卓吾，1527～1602）也是晋江出身。因此，这里必然有反拟古主义派的势力渗入。有可能还在归有光在世时，就有他的文章抄本或属业余爱好的八股文选集流传于唐宋派的活动区域内，因而得以闻名。从那以后，由福建的建宁令王子敬（昆山人）经手，出版了归有光的文集。这是最早的归震川文集。由此可见，归有光与福建的确有着很深的渊源。

此外，钱谦益（1582～1664）在《列朝诗集》的震川先生小传中，还记有这样一段传闻轶事：“嘉靖末，山阴（即绍兴）诸状元大授官翰学，置酒招乡人徐谓文长，入夜良久乃至。学士问曰：‘何迟也？’文长曰：‘顷避雨士人家，见壁间悬归有光文。今之欧阳子也。迥翔雒诵，不能舍去，是以迟耳。’学士命隶卷其轴来。张灯快读，相对叹赏，至于达旦。”

这一山阴地区，在归有光进入青年期之前，一直是王守仁（号阳明，1472～1528）讲学的基地。这里的学术空气自然会与公安派及李贽等人的文学主张有相同之处。因此他们能无视拟古主义派享有的权威，而在文学方面作出独立的判断。这是不足为奇的。另外，还请注意，把归有光的文章挂在墙上使之在江南一带流传的这样一种形式。还有，上边提到的感叹不已、不能舍去的人物，正是江南第一流的文人徐谓（字文长，1521～1593）。他也与反拟古主义派有渊源，是一位热爱文学艺术的才子。

就这样，归有光有了一批坚决的拥护者。仰慕其学识的

“四方来学者，常数十百人，海内称震川先生，不以名氏。”（见钱谦益《震川先生小传》）。王赐爵的《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中也有“常数十百人”的提法。

对来学者很多这一点，大家并无争议。但认为来自四面八方这一点却未必真实。实际上，其范围是很狭窄的。

钱谦益在《嘉定四君集序》（《初学集》卷三十二）中写道：“熙甫既歿，其高第弟子多在嘉定。犹能守其师说，讲诵于荒江寂寞之滨。”归有光的曾孙归庄（1613~1673，相当于钱谦益的门生），在《简堂集序》中也说：“故先太仆府君故居安亭。安亭为（位）昆山、嘉定之界，而去嘉定为近。当时，执经问字者，嘉定尤多。其后，府君之文章遂未传昆山。”当时，集中的弟子虽多达数百人，而其区域只不过是嘉定、昆山为中心。尤其嘉定的学统，一直持续到明朝末年，这一点值得注意。按归有光中举（名列第二）之年为嘉靖十九年，三十五岁算起，他于三十七岁时由故乡昆山迁往嘉定的安亭。从那以后，嘉定就成为他从事教育活动的中心。

青木正儿博士在《清代文学评论史》中指出，钱谦益与嘉定人李流芳一起去应举时，曾听李讲过关于唐宋八大家文章的见解，心中十分感佩。数年以后，又从嘉定几位老先生口中领教过归有光的遗说。这里提到的李流芳正是嘉定四君之一。钱谦益在《嘉定四君集序》中指出该四君为唐叔达、类子柔、程孟阳、李长蘅等四人。

刘声木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中还指出：“李流芳，字茂宰，一字长蘅，嘉定人，明万历丙午举人，属归有光学统。”

此外，青木正儿博士还推论，钱谦益是在南京应乡试

时，从李流芳那里听到归有光的文学主张（文说）的。青木博士这一推论（即钱谦益这时第一次了解归有光）的正确性，通过钱谦益的其他文章也得到了证实。钱谦益还为归有光之孙，归庄之父——昌世，字文休写过《归文休七十序》一文。他在该文中提到：“余与嘉定李长蘅（流芳）游，因以交长蘅之友新安程孟阳、昆山归文休。”由此可见，钱谦益认识李流芳的时间比结识归家为早。而李流芳同归昌世、王志坚齐名，共称三才子，他们是幼年时代的好朋友（引自赵经达《归玄恭先生年谱》中所引《苏州府志》）。

青木博士的这段论述，使我们更易于理解下述的情况。常熟出身的钱谦益本来距归有光讲学（学说和文说）的嘉定很近，反在南京通过嘉定人了解到归有光的学说。这一事实，一方面说明南京是江南一带交流新知识的场所，一方面也说明归有光的事迹已开始被人遗忘。下面，再举两三事例来说明南京在诗文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侯方域（1618～1654）于此地初次与唐宋派接触。他于顺治初年在故乡的河南商丘向乡人讲述归有光的文章。桐城派古文的开山始祖方苞的父亲方舟，于康熙初年在此地结识了钱澄之、杜濬和杜芥。桐城人方以智频繁往来于南京的时间则为时更早，在崇祯的末年。

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在钱谦益尚未宣扬归有光之前，归有光的谱系、对他的评价及其影响的范围等方面的问题。

（二）

归有光的文学主张，概括起来有以下六点：其一、注重

内容更甚于形式，主张论道的文章。其二、在文章的规范上，不仅推崇秦汉，也推崇唐宋，尤其尊重宋人的文章。这一点与拟古主义派相比，确有学术根柢。其三、联系上述两点，加强了直视现实的倾向。但他的“直视”主要侧重于个人的家庭和区域性的社会。在他的观察和凝视中，蕴藏着尊重家庭和同情弱者的博爱精神。其四、不追求华丽与夸张，而主张朴实而自然的表现。其特征是，在平淡之中流露出来的真实感人的叙述和细致入微的描绘。其五、在其区域性之中，正孕育着新的文章领域。这还意味着江南地方市民（有产阶级）社会的成熟，同时，还把吴地极流行的寿序墓铭也提到了文学的高度。其六、他的文学是建立在某种狭隘拘谨和爱好雅洁的基础之上的。归有光的诗与其文章相比显得过少。另外，当时的诗文家，不问他是拟古主义派还是唐宋派，大多对戏曲、小说等持同情、谅解的态度，而他却毫不留情。只有一次例外，在《张孺人墓志铭》中，他把张氏给小孩讲小说故事的情节原封不动记录下来，而未予批判。

那么，具有上述特点的归有光的文学及学识是怎样留传后世的？对此，首先得从其子孙的作用谈起。经万历丙子的武举人子宁及子祐之手，出版了《震川文集》初刻本，三十二卷。另由同族人道传经手出版了称作日本集的二十卷本。还有一种版本叫复古堂本，但只有上下两卷。除此之外，还有归有光孩子当中文名最高的万历辛卯举人子慕，字季思，具有家法。其文在沈德潜的《明诗别裁》中，也选用了九首诗。

总的感到，在其曾孙庄，字元恭出世以前，归震川集似乎主要是由他的子孙们刊印的。这一点可从其著书的传布范围和特点上看得出来。关于归庄的问题，将在另章说明。下面想谈谈，从归有光逝世到崇祯帝惨死的七十多年中，在文

坛上及在评价归有光方面发生的变化。

众所周知，自拟古主义派的祖师李攀龙于隆庆四年（1570）逝世后，从前与李共掌实权并支持过他的王世贞（1526～1590）便成为文坛的中心人物。王世贞出生的江苏太仓是苏州的邻县。而苏州，自元末明初以来，一直是南方市民文学活动的中心。此地出过近代的大家沈周和文征明。在这个小组中也包括祝允明及唐寅这类奇特人物。但其传统大体上带有城市优雅的气氛，对北方粗旷空气中产生的拟古主义派则持怀疑态度。前七子之一的徐祯卿也出生于此地。苏州名门皇甫汈兄弟与其表兄弟黄省曾虽曾为李梦阳的信徒，但未全面改变传统。青年时期的王世贞也曾受过文征明的知遇。

以上引自吉川幸次郎博士的《元明诗概说》，用以说明王世贞故乡的情况。他对王世贞“独家天下”的权势之大，描绘如下：“他是时代的第一巨人和伟人。整个时代都倾倒在他名声脚下。就连苏州及其他从前曾对拟古主义持怀疑态度的南方各地人士，也都毫无例外。尽管他不过是位在高官，居住在家乡太仓的豪华园林（开始名小祗园，后名弇山园）之中，但每日门庭若市，宾客络绎不绝，其中也包括道士、僧侣和游客。文人当中，凡表示追随者，提拔重用；凡表示反对者，排斥打击。追随者被分为等级：称老同志的李攀龙、徐中行、梁有誉、吴国伦、宗臣等为前五子，另有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等。

这位巨人到了晚年，在对归有光的评价上发生了变化，由反对转为支持。如在《归太仆赞并序》中，王世贞甚至写道：‘先生于古文词，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得意时，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

名家矣。其晚达而终不得意，尤为识者所惜云”。

这段话意味着什么？这表明，李攀龙死后，王世贞便摆脱了向李表示友好关系的束缚（在《沧溟先生集》中，王世贞的名字频繁出现。但除《与吴明卿书》以外，全是赞扬王世贞的话），同时，也从复古主义文学（它虽然雄浑有力，但有欠妥之处）中解脱出来，转而倾向于直视现实。这种直视现实的风气，是明末清初时代的整个社会倾向。自从清朝确立威信以后，政治批判变得淡薄，论理（逻辑）的因素有所发展。

另一方面，王世贞对归有光的这种评价还意味着他向南方市民文学的传统靠近了一大步。他一旦摆脱了李攀龙的约束，自然就会对地方的文化气息表示关切。如果再进一步探讨的话，王世贞对昆山出身的归有光表示同情，还另有原因。这就是他们之间还有同乡的地缘关系。原来王家的祖先在元代曾住过昆山。李攀龙在王世贞父亲忬的传记中曾写道：《总督苏辽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公传》，“至元，梦声为昆山学正，因家焉”。也就是说，他家在迁居太仓前，曾住昆山。当然不能由此断言，因他阅读震川文集，就说他背叛了拟古主义派的观点，但至少意味着拟古主义派本身确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质。

从王世贞逝世到天启二年（1622），共有三十一年时间。由于钱谦益再次发现归有光的时间属于天启年间的事，所以这一时期对归有光的评价尚存在疑点。从文坛状况看，拟古主义派因失掉领袖而掩旗息鼓，反拟古主义文学的各种思潮则在万历中叶以后日益显露出头角。

这时，公安地区（湖北省）的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与其兄宗道、其弟中道主张富有独创性的自由的表现

形式，显示了更好反映现实的新作风。而且众所周知，宏道以其任知事的吴县（江苏省苏州府）为中心，对该地的大多数人都有影响。另外还有公安三袁的挚友唐宋派的诗文家汤显祖（1550～1616）。他是戏曲《还魂记》的作者，时至今日其名声更高。在与三袁和汤显祖同代人中，还有一位中国最大的异端李贽。他从王学左派的立场出发，反对宋学礼教性的规范，坚持“童心说”。上述人物的思想中，都有受李贽影响的痕迹。他们能对戏曲、小说给予高度的评价，也与此有联系。这前后的三十年间，应该说是在与传统的权威进行斗争中战果最辉煌的时期。

那么，这些人对归有光又是怎样看的呢？袁宏道（他在文学界中没有归有光那些拘谨的表现）在《叙姜陆二公同适稿》中，在痛斥拟古主义派之后，首先说到唐顺之。他说：

“一时之文人，望之而不见其崖际者，或进之唐荆州是也。”接下来又说：“文词虽不甚奥古，但自辟门户亦能言所欲言者，昆山归震川是也。”同时，还提到唐寅、祝允明、文征明等，盛赞吴中文运的昌隆。

另外，汤显祖在《王季重小题文字序》的开头写道：“时之文字，能笔墨之外言所欲言者，三人而已。归太仆之长句，诸君变之绪言，胡天一之奇想。虽亦各有其病，天下莫敢望焉”。这里顺便补充一句。据徐朔方笺注，王思任，号季重。此文写作时间，推测为万历三十八、九年间。

综合上述可见，在这一时期中，归有光的名字不过与他人相提并论，并未把他视为特殊的权威，在诸家文集中也很少见到他的名字。但是这时，归有光的业绩尚未被人遗忘，人们对他确实仍怀有很大的敬意。

(三)

那么，归有光的直接师生集团又是以何种形式延续下来的？根据《桐城文学渊源考》卷一（此卷专记师事及景仰归有光的门生）小传中所载，在从游弟子数百人中，可视为优秀门生者有下列四人：

唐钦尧，字道虔，任抚州巡检，嘉定人。

张应武，字茂仁，昆山人。

邱集，字子成，嘉定人。

李汝节，字道亨，嘉定人。嘉靖乙丑进士，即与归有光同年举进士。

据《震川年谱》，此外尚有昆山的王执礼，字子敬，同为进士。他是震川文集中名字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人，但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中却未把他列入。这可能是由于归有光有时把他当作朋友看待的缘故。对于此人，归庄在《书先太仆全集后》中写道：“始，府君之门人王子敬，为闽之建宁令。刻于闽中，文既不多，流传亦少。”与王执礼一起，在文集中名字出现较多的人还有：沈孝，字敬甫。如沿着师生继承关系找下去的话，在传到昆山的归有光学统中，屡屡发现王执礼这个人。昆山人顾懋宏及周诗，字以育等，均曾师事过王执礼。大家认为，王执礼系统与张应武和归家是昆山路统的中心。

下面，我们再看看传入嘉定的学统的情况。上边提到过的四名优秀门生中，有三个人是嘉定人。其中唐钦尧受教时间最早，邱集和李汝节则为时稍晚，而昆山的张应武则比上述三人都更晚。其根据是，1. 他“年未及壮即弃诸生而师事归

有光”。2.曾与嘉定四先生中的二人“娄坚和唐时升之辈论古讲学”（见《桐城渊源考》所引《嘉定县志》）。上述唐时升，字叔达，乃前边提到的最早求教于归有光的唐钦尧之子。因此，他自然比张应武更为年轻。我们知道，娄坚曾直接受教于归有光。至于嘉定四先生中的另两个人是否直接受过归有光的教诲，则不得而知。但是有几点是明确的：直接聆听过归有光讲学的娄坚此时尚健壮，他与父子两代同为归有光弟子的唐时升友善。也就是说，“唐时升、娄坚、李流芳、程嘉燧夙有交往，熟闻嘉定的著名宿儒归有光的论述，服习之讨论之。其师承之议论，以经为经纬，以史为依据。以文从之，以字顺为体要。造车合辙，共固相与之”（见前书所引《嘉定县志》·《檀园诗集》）。

可见，归有光在嘉定的教学团体，于万历中叶之后，依然存在。不妨回忆一下，李流芳是万历丙午，即万历三十四年中的举人。也就是说，在传统文学的历史当中，这一地区即使在最激烈的动荡年代，仍然一直在聚精会神地传授着以纯朴而正宗的经史为基础的文章之道。

（四）

越过长达四十八年的万历年代，跨过只有一年的泰昌，世道又进入了天启和崇祯年间。从明末的二十几年到清初的顺治年间，在文坛上占据中心地位的人物是钱谦益。到了天启二年（1622），他已有四十岁。身为东林党的领袖，声望变得更高，大有压倒江南天地之势。顺治十七年（1660），钱谦益写了震川集的序文。他在回顾往事时写道：“余少汨没俗学，中年从嘉定二三宿儒游，邇传先生之讲论，幡然易辙，

稍知向方。先生实导其前路。启祯之交，海内望祀先生，如五纬之在天，芒寒而色正，其端亦自余发之。”可见钱谦益在中年以后，已认识到归有光位置的重要。

另外，在张传元、余梅元著《归震川年谱》的附录中，收录有《计孝廉东撰顺德府建归震川先生祠堂碑记》一文。文中把昆山归有光与王世贞当作同乡看待，文中载：“且当是时，同里王元美、浙东王伯安、或以文章、或以理学号召天下，俊雄魁杰之士，靡然风从。”而且作者对“同里”一词下了这样的注脚：“明时，割昆山、常熟、嘉定三县之地置太仓州，属苏州，故名同里，因隶属一府也。”但据查《明史》苏州府栏，太仓乃由以卫城为中心，外加昆山、常熟、嘉定三县割来的部分地区构成，并非把昆山、常熟、嘉定都包括在太仓之内。因此，余梅元的注解存在暧昧之处。但是，不管怎么说，由于二人住在邻县，自然怀有同乡的感情。在这一点上，也并无实质矛盾。在赵泉澄著的《清代地理沿革表》中也指出，清初的行政区划：“苏州府，于顺治初年，领州一：太仓；领县七：吴、长洲、昆山、常熟、吴江、嘉定、崇明。”由此可见，明末清初之际，钱谦益的故乡常熟，与归有光的故乡昆山及其第二故乡嘉定，从府的角度看，隶属同一个行政单位，因而有时则称为同乡。当钱谦益发现双方在各自的学识及文学上有共同之处以后，便决心树立归有光的典型，这是不难理解的。钱谦益认为，在天启崇祯之交，天下能掀起一股敬仰归有光的风潮，这功劳首先应当归于他自己。

这一点，在归庄于康熙三年写成的《侯研德文集序》中也曾予以肯定。他说，“嘉定之文派，故宗太仆，而虞山钱宗伯，则太仆之功臣也”。但不知何故，于康熙六年执笔的

《书太仆全集后》，在顺治十七年出版正集三十卷，别集十卷时，却丝毫未提及钱谦益的这一功绩。而如看一看钱谦益《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的话，则可明显看出，它与四部丛刊本序言的文字完全相同，这说明顺治十七年本实出自钱谦益之手。

更有甚者，归庄倒成了这次出版的中心人物。在归庄死后的康熙十四年出版的震川文集中，也只是在卷头写着：“曾孙庄校勘，虞山后学钱谦益选定，玄孙玠编辑”等字样。这里虽未完全抹煞钱谦益的功绩，亦未突出强调他在这次出版工作中所起的作用（这是违背他原来意图的）。钱谦益曾责难过归庄妄加改窜震川集的文字，还同尊崇归有光的汪婉发生过争论。这些都反映了争夺嫡系的一个侧面，也表明他们矛盾的激化。自从钱谦益于康熙三年逝世后，归庄心目中似有自命为有光嫡系（正统）的思想。

也许有点离题。康熙十四年版的系统，是流传最广的一种版本。在这以后再版的《新刊震川先生集序》中，虽然收录了全文，但却把笔者的名字删掉，而在卷末的震川先生小传中竟印成“见□□诗集□□□撰”的样子。亦即删掉了“列朝”的书名和“钱谦益”的名字。这恐怕是在乾隆帝痛斥“二臣”文人以后出版的版本。事实上，收录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百七十二卷中的《震川文集》三十卷和别集十卷的通行本题解中，已完全见不到钱谦益的名字，而只有“是篇由其曾孙庄所订”的字样。

现在再回到本题。钱谦益早在崇祯十六年（即写《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十七年以前），还写过《题归太仆文集》。文中提出：“余同熙甫之孙昌世互相搜访，得其遗文

若干篇，较槧本多十五，芟去误者焉。于是熙甫一家之文章粲然。”其后，又在《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的开头处回顾到：“往余笃好震川先生之文，与先生之孙昌世访求遗集，参读是正，始有成篇。”崇祯十六年，昌世之子庄三十一岁，发现归有光的旧几，欣喜若狂，写《太仆府君读书几志》。当然，这一时期，归家为树归有光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也是事实。但是，康熙十四年刊本的各个系统，比如来源于闽本的昆山本和常熟本，内容既不很多，而错情却不少。因此，归庄在康熙六年写的《书先太仆全集后》（先于出版写的跋文）中不禁慨叹说：“未有世皆知尊仰，而文反不流传，如府君者也。亡友南昌王于一，尝语庄曰：吾在江西，欲观君家太仆文，遍求不可得。前年黄州之顾赤方亦言：楚中士大夫，多知震川先生之名，而无繇见其文集。江楚去吴中仅二千余里，已不能流传到彼，则远者可知矣。”同为昆山出身的归庄的挚友顾炎武曾以周游全国闻名。他在《与汤圣弘》一文中也说：“而北方藏书甚少，购书良难。”又在《答汪荅文书》中说：“兼以北方购书为难。”就是在江南地方，具体说如在以苏州府为中心的南京一带地方，想弄到刊本也非易事。当然，在江西省一带，象藏书家艾南英家自然会有震川文集，但这是个例外。总之，当时该书已流传甚少，欲求善本来恢复其本来面目，的确很难。后来，到了乾隆年间，《四库全书》中采用的版本也不过是钱谦益和归庄收集的震川文集的通行本。这意味着，要想找到比通行本更好的善本，即使动用国家的权力也无济于事。

（五）

归庄信奉归有光。晚年，如上所述，在推广其著作方面作了一定贡献。但是，他并非祖述归有光的学统，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它的性质。正因为如此，连《桐城文学渊源考》的作者刘声木也认为，他似乎脱离了归有光的谱系。这可能因受明朝覆灭悲剧的客观影响，不问归庄主观意愿如何，仍然发生了质变的一面。归庄的父亲是归昌世，字文休（乃归有光之孙）。昌世与李流芳（向钱谦益介绍归有光学说的人）是亲密朋友。而钱谦益则相当于归庄的老师。如归庄果有祖述之意，则他所处的环境是再好不过的了。然而，他所迷恋的是司马法，他经常出入的文学结社是复社（对他为何加入另一文派的复社，尚存留疑问）。还因为他的挚友是顾炎武，所以在他的诗文中处处表现出很强的经世致用的倾向。钱谦益的另一位门生黄宗羲也同样表现了这样一种倾向。这是青年人对时代潮流敏感的一种共有的特点。归庄与顾炎武的文风十分相似。所不同的只在于他们在接受（抵制）归有光及其谱系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对顾炎武来说，归有光既是他的同乡、老前辈，也是他朋友的先祖和家学。按理说，顾炎武在自己的作品中，应该提到归有光的情况。但据现在所知，他只在《哭归高士》中，联系到归庄之死而对其先祖略加赞扬时写过“太仆经铿铿，三吴称学者”这样个别的诗句。在康熙十四年本的助刻者，即资金赞助人的名单中，也未见顾炎武的名字。书中倒有其外甥徐乾学的名字，而且他还写了序文。这也许因有其他种种原因，故请其外甥出面作代表；也许因资金不足，无力赞助；或因本来就